

编》中也有若干生化汤加减方，但此书的实际刊行晚于《客尘医话》。计氏所拟加减方，“寓变通于成法之中”，给读者在学习、应用古方方面，树立了一定的规范，开拓了思路。但产后病证，并非皆可用生化汤加减治疗者，如产后六淫致病、产后身痛腰痛、产后汗证、产后子宫脱垂以及乳痈等常见外科病证等，又宜跳出生化汤的圈子，根据不同的病证，结合产后的特点，分别予以辨证论治。

二、对几种病证的识见

1. 治妇女病及“肝气”

计楠治疗妇女病，特别重视冲任之脉，因冲任“为经脉之海，皆血之所从生，而胎之所有系。”明于冲任则本源洞悉。在立方遣药方面，注意调整或补益冲任，这是妇女病的治疗特色。至于妇女“肝气”，临床十分多见，此病在病理上每有肝血不足。计氏认为：“治以疏伐则刚，治以滋养则平。”如属肝气久痛入络，多有血少气滞，治当“养血和络，补水滋木。”（以上见卷二“妇科述略”）这个观点大致是受高鼓峰、魏玉璜治疗肝病的影响，高氏的滋水清肝饮（见杨乘六辑《医宗己任编》）和魏氏的一贯煎（见《柳州医话》治“肝燥胁痛”方），基本上都是以滋养为主，而少用疏伐之品。计氏所说“疏伐”，系指任意用枳壳、香附、青皮、郁金等破气药，认为滥用这类药物，易于耗散元气，使阳衰而阴竭，不可不慎！他指出古方逍遥散“并无泻伐之品。”《程杏轩医案辑录》云：“治肝三法，辛散、酸收、甘缓，逍遥一方，三法俱备。”可见当时医家从长期临床实践中，认识到肝病、肝气在治疗法则方面的利弊所在，这也是计氏确立以滋养法治疗“肝气”的重要理论根据。所谓“肝无补法”，是指肝气不可补，非指肝血，故肝血虚当补。计氏又说：“补肝血莫如滋肾水，肾者水之母也。母旺则子强，是以当滋化源……。”（见卷二“妇科述略”）在临床应用方面，补肝血与滋肾水究竟是有区别的。但朱丹溪所说的滋阴概念，往往又是包括养血治法在内的。但欲真正达到补肝血的目的，结合健脾益气亦属常用的兼治法，临证不可不知。

2. 痛证用补法

世俗有痛证不宜用补法之说，这种观点有它的片面性，计氏举《金匱要略》中张仲景用小建中汤治腹痛，及后世用补肝汤治肝血不足所致胁胀、筋急、肢厥、心腹引痛等证。指出：“诸痛无补，言气逆滞也。然壮者气行则愈，怯者着而成病。真气虚乏之人，诸邪易于留着。着则逆，逆则痛，疏刷之中，不可无补养之品。徒事攻击则正气愈虚，邪愈着而痛无休止也……。”（卷一“杂症

述略”）启发读者凡遇痛证，必究其所因，辨其虚实。如虚证头痛，当诊其属气虚、血虚或肾虚等病因，恰当地运用补法，这是临床上屡见不鲜的治法。

3. 疫病治法

关于疫病，计氏特别强调以“解毒为先务。”至于解毒药的选用，指出“吴又可专用大黄驱毒秽……；”张路玉用人中黄配合葱、豉作为解毒药；叶天士则用银花、金汁凉解之品。同是解毒药，计氏认为叶氏法“最为稳当。”（以上见卷一“杂症述略”）计氏还十分欣赏喻嘉言在《尚论篇》“卷首”有关疫病的三焦分治法，即“上焦如雾，升而逐之，佐以解毒；中焦如沤，疏而逐之，佐以解毒；下焦如渎，决而逐之，佐以解毒”的治疗大法。这个治法原则，已故名医孔伯华先生对此十分推崇，他在临床应用中，证实它具有现实的临床指导意义，可见解毒法在治疗疫病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*

*

此外，《客尘医话》对风温、喉痧、温疟、咳嗽、消渴、鼓（臌）膈、脚气、吐血、幼科惊症（以上见卷一“杂症述略”）、妇人血结胞门、妊娠伤寒及温热症（见卷二“妇科述略”）等论述，均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，兹从略。

至于《客尘医话》的刻本，据《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载，国内只有南京图书馆有此书的初刻本，刊于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。1914年，《黄寿南沙辑医书二十种》中收载此书，1918年，上海大东书局曾出版此书的影印本，1936年，曹炳章编纂《中国医学大成》时，亦将此书辑入。建国后未见重印，故其流传亦较不广泛。爰作评介如上，不当之处请予指正。

茅根汤治小儿急性肝炎

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

张鑫华

我们对急性黄疸型肝炎患儿，拒绝服用中药者15名，采用《青医学报》1979年2期57页报道的单纯煎服一味茅根代茶饮，有一定疗效。

治法：鲜茅根一把，洗净，或干茅根60~120克，宽水煎汤，加适量白糖，为一天量，代茶饮。

病例介绍：杜×，女，8岁。家长代诉：食欲减退、全身疲乏4天，目黄、尿色如浓茶样2天。察舌质红、苔黄腻，脉滑数。体检肝大肋下一指半，质软，有压痛。肝功能：黄疸指数18单位，谷丙转氨酶300单位。嘱休息并服茅根汤半个月后，症状减退，复查肝功能已正常。